



读书给人以乐趣，给人以光彩，给人以才干。

—— [英] 培根

复活

〔插图本〕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王景生◎译

В о с к р е с е н и е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活／(俄罗斯)托尔斯泰(Tolstoy, L. N.)著;王景生译.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2

ISBN 7-5402-1116-4

I. 复… II. ①托…②王…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6606 号

责任编辑:王志中

复活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 × 1168mm 大 32 开 14.5 印张 385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2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5.00 元

译 序

高尔基曾经说过：“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在我看来，这是人类为自己所建造的三座纪念碑。”高尔基此论绝非河汉斯言，大而无当。从近代欧洲乃至整个世界范围的文学来看，能与托尔斯泰比肩同声者，实无几人。托尔斯泰有如高山，令后世所仰止。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托尔斯泰以自传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和短篇小说集《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登上俄国文坛，旋即引起欧洲文学界的注意，然而直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半叶，托尔斯泰在欧洲文坛上却还不是一个叫得响的名字。一八七九年，《战争与和平》法文译本的出版震撼了世界文坛，为托尔斯泰赢得不世出的殊荣。托尔斯泰小说的声誉从此鹊起，而后《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的发表更使其专美于世，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瑰丽篇章。

《复活》(1889—1899)是托尔斯泰晚年呕心沥血十余载的长篇巨著，也是他一生思想和艺术的结晶。

正如托尔斯泰此前的许多作品一样，这部小说的情节取自一个真实的故事。据彼得堡某地区法院的一位法官回忆，一八八七年六月，他到托尔斯泰家做客时曾向作家讲述过他亲自接触的一个故事。一次，法院审理一个妓女被控偷窃嫖客一百卢布的案子，陪审团中有一个青年，发现被告竟是他多年以前在一个阔亲戚家客居时诱奸的养女。于是他良心发现，设法同她在狱中相见，并表示愿意和她结婚。后来，这个女犯病死狱中，那个青年也不知所踪。当时，托尔斯泰非常认真地倾听这个故事。毫无疑问，这个青年和妓女的故事触发了作家的创作冲动。不过，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作家数易其稿，描写对象和主题几经提炼与深化，才最终写出了这部铁面无私的大书。

小说名曰《复活》，顾名思义，其中必有人“复活”。那么，“复活”的人究竟是谁呢？是聂赫留朵夫？还是玛丝洛娃？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对此，评家众说纷纭。不过，细品全书，聂赫留朵夫的“复活”恐怕更接近于作者的愿望。

聂赫留朵夫品性善良，且有抱负。他对自己所拥有的贵族特权深为不满，把名下的那一部分土地分给了农民。起初，他对姑母家的养女卡秋莎·玛丝洛娃的爱是真诚的。后来，他参军当了军官，军营生活却使他堕落成为一个吃喝玩乐的花花公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诱奸了自己当初曾热恋过的姑娘。此后，他在罪恶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法庭上遇见卡秋莎之前，他正与一个有夫之妇私通，同时又向一个贵族小姐求婚；此外，他已放弃否定土地私有的理论，准备接受母亲的大宗遗产。法庭上和卡秋莎的不期而遇，极大地震撼了他的心灵，尤其是她被判苦役后发出的哭声，更是触动了他那似乎并未完全泯灭的良知。他痛悔过去的劣行，开始走上精神“复活”的道路。

为了赎罪，聂赫留朵夫多方替玛丝洛娃奔走上訴，并打算同她结婚。他对事物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比如，他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感到不满并持批评态度；对他曾想与之结婚的贵族小姐及其一家人的庸俗和虚伪心生厌恶；对他探监时耳闻目睹的专制制度的黑暗更是深恶痛绝。于是，他的精神“复活”进入第二个阶段，即从对自己的罪恶的认识上升到对整个统治阶级的认识，从对玛丝洛娃一人的同情转到对整个劳动阶级的同情。这时，他头脑中的贵族阶级思想逐渐为宗法制农民思想所代替。他认识到，农民贫困的根源就在于土地被地主阶级所霸占。于是，他身体力行，把自己的土地分给了农民。应当说，在这一点上，“忏悔”的贵族聂赫留朵夫大大超越了他的前辈——《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玛丝洛娃的上诉被驳回，聂赫留朵夫对统治阶级及其法律的本质的认识也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他的精神逐渐“复活”，伴随玛丝洛娃踏上了去往西伯利亚流放地的遥远路程。

在西伯利亚的三个月，是聂赫留朵夫彻底醒悟的三个月。他

最终认清了统治阶级吃人的本质,然而令他苦恼的是,他非但看不出任何可以战胜它的方法,甚至连怎样做才可以战胜它也不能理解。无奈之中,他拿起了《福音书》,不料却从中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为了摆脱苦难,惟一可行的方法便是在上帝面前永远承认自己有罪,因而既不可惩罚他人,也不可纠正他人。聂赫留朵夫从此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他的精神和道德“复活”了。

不可否认,女主人公玛丝洛娃也有她自己的“复活”历程。不过,她的“复活”却完全没有聂赫留朵夫的那种赎罪的味道。当聂赫留朵夫第一次探监时,她所“复活”的仅仅是她当初的那个清清白白的自我而已,她那时仍处于“堕落”之中。她习惯性地冲他媚笑,还索要卢布。聂赫留朵夫第二次探监时,特意向她表示忏悔,并提出同她结婚的要求,这一切引起了玛丝洛娃对往事的回忆和对他的仇恨;回忆的大门一经打开,玛丝洛娃便逐渐从浑浑噩噩的生活中苏醒过来。聂赫留朵夫第三次见到她时,她同以前相比已经判若两人。聂赫留朵夫在日记中说她正在“复活”,的确不无道理。不过,玛丝洛娃的“复活”虽然始自聂赫留朵夫的“忏悔”所引起的对美好往事的回忆,但它的最终完成却是在她与流放地的政治犯接触之后。她受到这些品德高尚的人的影响,学到了他们敢于为理想献身的精神,尤其是西蒙松对她的发自内心的爱情,更使她意识到了人的尊严和自身的价值。她重新爱上了聂赫留朵夫,却不愿因此耽误他的前程而甘愿同西蒙松结合。少女时代的卡秋莎终于回归。她的纯洁的道德也失而复得。玛丝洛娃在精神上彻底“复活”了,或者毋宁说她得到了完全的新生。

勿庸讳言,小说中男女主人公通过各自的“忏悔”与“宽恕”,双双走向精神和道德的“复活”,使其“人性”得以复归,这一切带有浓厚的“不以暴力抗恶”及“道德的自我完善”的“托尔斯泰主义”的味道;作为说教者,托尔斯泰自有其可笑的地方。然而,作家借聂赫留朵夫上访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对俄国城乡的阴暗面以及对宫廷、法庭、监狱和教会的抨击与揭露,却是他此前的文学作品中从未有过的,这一切分明表现出“清醒的现实主义”的特点;作为艺术家,

托尔斯泰确有其伟大之处。

较之为托尔斯泰赢得盛誉的《战争与和平》和有“艺术之神”称号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的艺术性似有所不及。其中原因,则是深层次的。作为艺术家,托尔斯泰在思想和哲学方面的追求与探索,其执著和真诚的程度,不但在俄罗斯文学,就是在整个世界文学中恐怕也难找到第二人。他一生苦心经营自己的理想王国,试图为俄国乃至全人类提供一幅道德完善、社会改良的美好蓝图(蓝图的正确与否暂且不论)。托尔斯泰本人也许并未意识到,其实正是他的文学作品才为他的思想赢得更多的读者和崇拜者。尽管托尔斯泰有着思想家、宗教领袖、现代文明的批评者、俄罗斯的“良心”等诸般尊贵的称号,但他主要是一位艺术家,而且是少数几个攀上艺术顶峰的作家之一。不过,托尔斯泰似乎并未十分珍惜他作为艺术家所享有的极高地位和他文学作品的声誉,尤其在他后期,文学几乎成了他传达思想的工具,他甚至为了思想追求而否定自己的作品。正如美国作家豪威尔斯所说,托尔斯泰“用人类的良心代替了艺术的良心”。假若我们的说法可以成立,那么它应当成为把握托尔斯泰后期一些作品艺术性衰弱现象的一个前提。

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期,即写完《安娜·卡列尼娜》之后,随着托尔斯泰世界观“激变”的发生,他叙事的倾向明显起了变化:一方面,试图从根本上探寻社会和道德的真理;另一方面,则渴望以他所向往的真正的道德生活替代不公平的罪恶生活。托尔斯泰后期叙事的倾向性也使其叙事的风格产生了变化;其实,托尔斯泰叙事的风格此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直处在演变之中。即以心理描写的方法为例。在托尔斯泰早期的作品中,主人公内心的直接意识活动十分突出地出现于叙述的前景。作为描写直接意识活动最主要方法的内心独白,包含性极为广阔地跃然纸上,而作为内心独白“极端形式”的意识流也同时得到了更多的表现机会。创作《安娜·卡列尼娜》时期,托尔斯泰的叙事风格发生了变化。如果说托尔斯泰在此前的文学叙事中曾嫌普希金的心理描写过于粗线条和“光秃秃”,那么此时则转而强调研究普希金《别尔金小说集》这

个“宝库”和学习“普希金原则”的重要性。虽则如此,《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内心独白依旧蔚然可观,而意识流在其叙述上也迹近炉火纯青的境界。托尔斯泰叙事风格的真正改变,诚如上述,始自其世界观“激变”所引发的叙事倾向的转移。仍以心理描写的方法为例:中前期独领风骚的内心独白叙述退居次席,意识流几乎完全消失,而占主导地位的则是“通过场面表现内心生活”和心理叙述(对人物心理活动的直接描写和间接引语叙述)。

《复活》作为托尔斯泰后期叙事中最重要的作品,以“外部表现、动作、行为、场面”表现内心活动和心理叙述,自然成为托尔斯泰心理描写的主要原则。于是,以细致展现人物心理变化过程见长的内心独白,便失去了它以往的辉煌地位。《复活》的叙事中已然找不见多种类型竞逐、意识全面展开的内心独白叙述,有的只是次数稀少、类型简化和长度缩短的内心独白,且大多出现于男女主人公,尤其是聂赫留朵夫的意识活动中。

聂赫留朵夫是托尔斯泰精神探索型主人公系列中的人物。他的精神生活的发展与变化是叙事的主旨之一。托尔斯泰往往更多地以叙述者的直接心理描写和间接引语叙述来表现聂赫留朵夫的心理活动,作者的独白、全知全能的作者的声音在叙事中起着决定性的和结构上的突出作用。然而,从人物心理真实(托尔斯泰的叙事恰恰十分看重这一点)的角度而言,像聂赫留朵夫那样热中于自我剖析的人物,他的内心活动中不出现直接内心话语则是不可想像的。不过,用于聂赫留朵夫身上的内心独白叙述,其运用场合及次数却颇有选择性和节制性。例如,法庭审理玛丝洛娃案件的二十几章叙事中,聂赫留朵夫自始至终皆在场上。当认出被审的女犯便是他当年诱奸的卡秋莎时,他的第一个反应即用内心独白的形式来表现:“‘这决不可能,’他目不转睛地瞧着这个女被告的脸,暗自想道,‘可是怎么叫柳包芙呢?’听到她的回答,他心里想。”此后的审理中,聂赫留朵夫还有两句内心独白。第十一章:“‘难道她认出来啦?’聂赫留朵夫心惊胆战地想,感觉血直往脸上涌。”第十九章:“‘她认出来啦!’他想。于是,聂赫留朵夫身子缩成一团,似

乎在等待着打击。”与玛丝洛娃的不期而遇，犹如一块石头，激起聂赫留朵夫心海中的层层波澜。再现意识活动的语言天地里，心理叙述占据了叙述的前台，内心独白似乎仅仅起着点缀的作用。但它无疑又是叙述中最为活跃的话语部分，或者换言之，最为活跃的意识层次，而且是聂赫留朵夫心理活动的直接展示。这种适时的心理展示，画龙点睛，为其叙述平添了生动之感。

玛丝洛娃内心世界的描写，是托尔斯泰的一项“真正的艺术发现”。她道德沦丧和“复活”的过程，同样是托尔斯泰的叙事主旨之一。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玛丝洛娃的心理活动中显然缺少诸如聂赫留朵夫等贵族老爷们的那种复杂、多变、犹豫与反复的意识成分。但她的内心世界并非一片空白，“复活”后的玛丝洛娃，身上闪现出动人的光彩。对于玛丝洛娃的心理活动，托尔斯泰选择的叙述方法，诚如俄罗斯学者所说，“不是大段的内心独白和对话，梦，回忆，而是托尔斯泰本人所说的‘通过场面表现的内心生活’。”^① 此处托尔斯泰所谓的“场面”，指的是动作、姿势、表情、眼神等心理活动的外显行为，于是内心独白似乎完全失去了用武之地。其实不然。在一些必要的地方，作者并未回避这种行之有效的叙述方法：

“他在明亮的车厢里，坐在丝绒软椅上，喝酒说笑，我却在这儿，在泥地上，在黑暗中，在雨里和风里——站着哭。”卡秋莎想，停住脚步，把头向上一仰，双手抱住头，放声痛哭。

“判我刑的时候，我还哭了呢，”她说，“我真得终生感谢上帝才是。要不我一辈子也不会明白我现在知道的这些事。”

第一例出自第一部第三十七章。玛丝洛娃被判了苦役。那一夜，她久久不能入睡，想起了许多往事，惟独没有想到聂赫留朵夫，而且在法庭上也没有认出他来。作者用倒叙的叙述方法向我们提供了她最后见到聂赫留朵夫时的情景：那天夜里，她便怀了孕，本

^① 参阅奥普尔斯卡娅：《列·托尔斯泰现实主义的演变》，《俄国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发展》第三卷第三十三、第三十四页，莫斯科，一九七四年。

指望他会顺路来一趟的,但他打来电报,说不能来。她决定亲往火车站见他一面。这是个秋天的夜晚,风雨交加。她跑到车站,刚刚从车窗里找到他,火车就徐徐开动了。她跟着火车走,聂赫留朵夫没有看见她。火车越开越快,她在后面跑,跑过水塔,风迎面吹来,吹掉了她的头巾,她还在跑。一个女孩叫她。她停住脚,于是便有了上引之内心独白,隔过三行叙述,又有一句内心独白:“等会儿再来火车——往车底下一跳,就完事儿了。”

第二例摘自第三部第三章。她每天和政治犯在一起,尽管行路艰难,但这些他从未见过的人们,为她揭示了她从不知道的各种生活趣味。于是便有了这段思想的直接表露。

就这两例内心独白在叙述话语的时间位置而言,两者皆出现于玛丝洛娃人生道路的转折点:前者是她精神的最初觉醒,她看清了车厢内外(实则是当时社会的缩影)两个世界的对立,她从此不再信善,也不再信上帝。不过,在她当时的思想状况下,这一觉醒却导致她走向堕落,但这也是贫家妇女经常遭到的可怜命运:后者则是她的最终觉醒,是她在“新同伴”启发下获得的新生。其叙事功能已不言而喻。从这两个例子不难发现,对于内心独白的叙述方法,托尔斯泰此时已惜墨如金,只是在人物心灵变化的关键时刻才加以运用。至于内心独白的话语特征,则是十分口语化的句型和词汇,颇为符合玛丝洛娃的身份。

以上蜻蜓点水式的分析,仅仅涉及《复活》叙事艺术的一个侧面,但滴水中也映现出太阳的斑斓。小说历经十年的惨淡经营,其叙事的完整与统一,浑然天作,而情节的集中,结构的紧凑,细节的细腻,肖像的生动,足见托尔斯泰对艺术的追求,老来更其精纯。

《复活》成书的那一年,托尔斯泰七十一岁。在世纪末的浮躁中,这位老人依然故我地在其精神世界中俯视俄国的社会,不辞辛劳地建造他的理想王国。他把自己的思想倾注在聂赫留朵夫身上。然而,一个七旬老翁,特别是“激变”之后的托尔斯泰那样的老翁与一个三十五岁的、喜爱犬色声马生活的青年贵族聂赫留朵夫,两者的心灵硬安在一起,不免给人一种不自然的感觉,也缺乏客观

的真实性。聂赫留朵夫的形象毕竟作者夫子自道的色彩过于浓烈，现实生活中又能去那里寻呢？而小说第三部的叙事，多次直接引用《福音书》中的道德说教，则尤为令人读之生厌。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因而受到削弱，自不待言。

虽则如此，《复活》作为托尔斯泰的“艺术遗嘱”，依旧不失为歌颂人类同情心的最华美的诗章之一。诚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所言，《复活》较之其他作品，能让人更清楚地看到托尔斯泰那双直达心灵的眼睛。

目 录

译 序	1
第一部	1
第二部	199
第三部	365

第一部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至第二十二节：“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四十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

一

尽管几十万人集聚在一个不大的地方，千方百计把他们住得很拥挤的土地毁得面目全非，尽管他们在地上铺满石头，不让任何东西生长，尽管小草刚一出土就被除掉，尽管煤炭和石油烧得烟雾腾腾，尽管树木遭到砍伐，鸟兽尽被驱逐，——春天甚至在城市里，依旧还是春天。太阳暖暖地照着，青草在没有被铲尽的地方，不仅在林荫路的草坪上，而且在石板的夹缝里，死而复生，呈现出一片绿色。桦树、杨树和稠李长出粘粘的、散发着清香的嫩叶，椴树上鼓起一个个绽裂的幼芽。寒鸦、麻雀和鸽子像春天那样欢快地筑起巢来，连被太阳晒暖的苍蝇，也沿着墙根儿嗡嗡地飞动。植物啊，鸟雀啊，昆虫啊，儿童啊，全都快快乐乐。惟独人们——大人们，成年人们——却永不休止地欺骗自己和相互欺骗，折磨自己和相互折磨。成年人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这个春天的早晨，这种专为造福万物而出现的人间的美，——能激发和平、亲睦、友爱的美，神圣而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发明的那套一个人统治另一个人的把戏。

譬如，省监狱办公室的人们就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所有的动物和人都能感受春天的魅力和欢乐，而是前一天收到的一件编着号码、盖着大印、标着罪名的公文，上面指定今天，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点前，将狱中三名在押的案犯——两女一男，解送法庭受审。两名女犯当中，有一名是要犯，必须单独解送。于是，遵照这道命令，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八点钟，看守长走进女监又暗又臭的走廊。跟着他走进来的是一个面带倦容、鬓发花白的女人，穿着袖口镶金绿的制服，腰里系着蓝边的带子。这是女看守。

“您是玛丝洛娃？”她一边问，一边跟这位当班的看守长朝走廊里的一间牢房门口走去。

看守长哗啦一声打开铁锁，拉开牢门，一股比走廊里更臭的气味涌了出来。他吆喝道：

“玛丝洛娃，去过堂！”又把牢门掩上，等她出来。

监狱的院子里，还是新鲜的、爽人的田野上的空气，那是风从城外刮过来的。然而走廊里却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带着伤寒病菌的空气，充满粪便、焦油和腐物的气味，足以让任何一个刚进来的人立即感到烦闷和忧郁。女看守虽然闻惯了这种恶浊的空气，乍一进来，也免不了有这样的感觉。她刚进走廊，顿时感到周身无力，昏昏欲睡。

牢房里传出忙乱的声音：女人说话的声音和光着脚走路的声音。

“快点儿，找什么呢，别在那儿磨蹭，玛丝洛娃，听见没有！”看守长冲着牢门喊道。

过了两分钟光景，一个身材不高、胸部非常丰满的年轻女人，穿白衣白裙，外罩灰色囚袍，大步走出牢门，灵活地转了一下身子，在看守长身旁站住。这个女人脚上穿着麻布长袜，外面套着棉囚鞋，头上包着一块白头巾，几绺髻曲的黑发显然故意从头巾里露了出来。她脸色惨白，长期坐牢的人大多具有这种特别的脸色，仿佛地窖里的土豆新生出的白芽。她那双不大的胖乎乎的手和从囚袍宽大的领口露出来的丰满的白脖子，也是这种颜色。在这张脸上，



尤其是在惨白无光泽的脸色的衬托下，那双乌黑发亮的眼睛叫人称奇，眼睛稍稍有些浮肿，但非常有神，其中一只眼睛略微带点儿斜视。她把身子挺得笔直，丰满的胸脯高高耸起。她来到走廊上，微微仰起头，径直看着看守长的眼睛，停住脚，露出一一种顺从的神情。看守长刚要关上牢门，不料一个没戴头巾的白发老太婆，从门里探出她那张苍白、冷峻、布满皱纹的脸来。老太婆刚开口对玛丝洛娃说着什么，可是，看守长把门抵住那老太婆的脑袋，她的脑袋就缩回去了。牢房里响起女人的哄笑声。玛丝洛娃也微微一笑了一笑，把脸转向牢门上装着铁栅栏的小窗口。老太婆从里面凑近窗口，用沙哑的嗓音说：

“最要紧的，一句话也别多说，咬定了就别改口，这样就行啦。”

“只要有个结局就够啦，反正不会比现在更糟的。”玛丝洛娃说着，摇了一下头。

“当然，结局只会有一个，不会有二个，”看守长说，露出一一种长官的自信，显然以为自己讲话很俏皮。“跟我来，开步走！”

老太婆的眼睛从小窗口消失了。玛丝洛娃回到走廊的中央，迈着细碎的快步，跟在看守长的后边走着。他们沿着石头楼梯下去，走过比女监更臭更闹的男牢房，每个牢门的小窗口里都有男犯的眼睛注视着他们。然后他们走进办公室，里面已经站着两个持枪的押解兵。坐在那儿的文书把一份满是烟味的公文递给一名士兵，指着女犯说道：“交你接管吧。”

那名士兵——有麻子的红脸膛下诺夫戈罗德汉子——把公文掖在军大衣袖口的翻头里面，目光瞟着女犯，笑嘻嘻地朝颧骨很高的楚瓦什卡同伴挤了挤眼睛。两名士兵押着女犯下了楼梯，向大门口走去。

大门上的一扇小门打开了，这两名士兵押着女犯跨过小门的门槛，来到院子里，然后走出围墙，沿着铺满石子的街道穿过闹市区。

马车夫、小店伙计、厨娘、做工的、官吏们纷纷止住脚步，好奇地打量着女犯；有人摇摇头，心里想道：“瞧，这就是干坏事儿的下

场，还是我们这样做人好。”孩子们恐惧地望着女强盗，只是她被士兵们押着，不会再为非作歹，才使他们安下心来。一个乡下汉子，卖掉了木炭，在茶馆里喝足了茶，走到她跟前，画了个十字，送给她一个戈比。女犯脸红了，低下头，嘴里说了句什么。

女犯觉察到众人投向自己的目光，并不转过头去，而是悄悄地斜视那些瞧她的人，大家对她的注意，使她感到开心。春天的空气，与牢房里的气味相比，清爽多了，也使她感到开心，不过，她好久没有走路了，这时又穿着笨重的棉囚鞋，双脚在石子路上走得生疼，于是她瞧着自己脚下，尽可能把步子迈得轻些。他们经过一家面粉店，店前有许多鸽子，摇摇摆摆地走来走去，没有受到谁的欺负，女犯脚差点儿碰到一只瓦蓝鸽；鸽子腾地飞起来，扇动着翅膀擦过她的耳边，掀起一阵清风。女犯微微一笑，接着想起自己的处境，不禁重重地叹了口气。

二

女犯玛丝洛娃的身世极为平凡。玛丝洛娃是一个未婚女农奴的女儿，母亲跟随喂牲口的外祖母住在两个地主小姐的庄子里。这个没出嫁的女人每年都生孩子，并且像乡下常有的那样，孩子受过洗礼，做母亲的就不再给这个她不愿意他出世、不需要而且妨碍干活的孩子喂奶，孩子很快就被饿死。

已经有五个孩子这样死掉了。他们都受过洗礼，然后都吃不到奶，也就都死了。第六个孩子是和一个过路的茨冈人私通后生下的，是个女孩儿，她的命运本不会有什么两样，可是事有凑巧，两个老小姐中的一个来到喂牲口女工们住的木头房子，训斥她们做的奶油有股牛臊气。当时产妇和漂亮的胖娃娃正躺在房子里。老小姐训斥她们奶油做得不好，又训斥她们不该让一个刚生过孩子的女人住进来，骂完正要走，忽然看见那孩子，动了怜悯之心，表示愿意做她的教母。她真的为女孩儿施了洗礼，而后因怜悯自己的教女，时常送些钱和牛奶给母亲，于是女孩儿活了下来。两个老小姐因此叫她“得救妞”。

小孩儿长到三岁，她母亲得病死了。喂牲口的外祖母觉得外孙女是个累赘，两个老小姐就把女孩儿带到自己身边抚养。这个黑眼睛的小姑娘长得十分活泼可爱，两个老小姐从她那儿得到不少乐趣。

老小姐是姐妹俩：妹妹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心地比较善良，为小姑娘施洗的就是她，而姐姐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却比较严厉。索菲娅把小姑娘打扮得漂漂亮亮，还教她读书，一心想把她调教成自己的养女。玛丽娅却说，应当把这孩子调教成一个会干活的人，一个出色的侍女，因此对她要求严格，常常处罚她，遇到心情不好时，甚至还打她。于是，在两种教育态度的影响下，当小姑娘长大时，她的身份半是侍女，半是养女。她的名字的叫法也不偏不倚，既不叫雅气些的卡金卡，又不叫俗气的卡吉卡，而是叫普普通通的卡秋莎。她做针线活，收拾房间，用白粉擦拭圣像，煎炸食品，磨咖啡豆，煮咖啡，洗些零散衣物，有时陪两个老小姐坐坐，给她们读书消遣。

有人向她求婚，可她谁也不想嫁，觉得跟那些向她求婚的干力气活的人过日子，她受不了，她已过惯地主家舒适的生活了。

就这样，她生活到十六岁。在她满十六岁那年，老小姐家里来了一个在大学念书的侄子，是位很有钱的公爵，卡秋莎一下子爱上了他，却不敢对他讲，甚至也不敢对自己承认这一点。后来过了两年，这位侄子在奔赴战场的途中，顺路来到姑姑家，在她们那儿住了四天，临行前夜，他诱骗了卡秋莎，第二天塞给她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就走了。他走后五个月，她才清楚地知道，自己怀了孕。

从那时起，她对一切都感到厌烦，心里只想着怎样才能摆脱即将临头的耻辱，她不乐意服侍两个老小姐，敷衍了事，而且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发起脾气来。她对老小姐讲了不少无礼的话，过后自己感到后悔，就提出辞工的要求。

两个老小姐也对她很不满，放她走了。从她们家里出来，她到一个区警察署长家当侍女，但只在那儿待了三个月，因为署长虽是个五十岁的老头儿，却不停地调戏她，有一次，他纠缠得特别凶，